



馆藏国宝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史前文明的灵动篇章

□ 本报记者 罗敬宇

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展厅里，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以其独特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史前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不仅是马家窑文化的重要代表，更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生动写照。

时光邂逅：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的惊世发现

1973年，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的一次考古发掘，如同一把钥匙，轻轻打开了通往史前文明的大门。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高约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整体呈葫芦状，下部略内收，瓶颈则巧妙地塑成了一个圆雕的人头像。这尊头像，五官清晰，表情生动，仿佛一位远古先民正穿越时空，与我们进行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的出土，不仅为考古学家提供了研究马家窑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无数艺术爱好者和学者的目光。它如同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遥远时代的风貌，感受先民们的智慧与创造力。

匠心独运：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的艺术魅力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的制作工艺极为精湛，体现了马家窑文化高超的制陶技艺。它采用细腻红陶制成，经过精细的打磨和烧制，使得瓶体表面光滑细腻，色泽温润如玉。在瓶身上，工匠们巧妙地运用了黑彩纹饰，以圆弧形和变体鸟纹为主要元素，将瓶身装饰得既美观又富有动感。这些纹饰不仅具有装饰作用，更蕴含着先民们对于自然界的观察和理解，以及对于生命和宇宙的敬畏与崇拜。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的器口设计更是匠心独运，将人头与瓶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人头形象逼真，五官清晰，表情生动，仿佛一位远古先民正在凝视着我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故事。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先



民们对于人类自身的崇拜和尊重，更反映了他们对于生命和自然的深刻认识。

寓意深远：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的文化内涵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更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它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向我们展示了马家窑文化的繁荣与辉煌。这件彩陶瓶的出现，标志着先民们已经掌握了高超的制陶技艺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水平、审美观念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信息。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的器口设计，寓意着先民们对于人类自身的崇拜和尊重。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先民们对于生命的珍视和敬畏，更反映了他们对于自然界的深刻认识和深刻理解。在原始社会中，人类对于自然界的依赖和敬畏是显而易见的，而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的设计，正是这种依赖和敬畏的生动体现。

此外，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还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和巫术内涵。在原始社会中，宗教和巫术是维系社会稳定、保障人类生存的重要手段。先民们通过制作这种具有特殊寓意的彩陶瓶，来祈求神灵的庇佑和祖先的保佑，以祈求丰收、平安和幸福。这种宗教和巫术的内涵，使得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在史前社会中具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璀璨瑰宝：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的文物价值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作为一件珍贵的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这件彩陶瓶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史前文明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在历史学领域，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马家窑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通过对这件文物的深入研究和

分析，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了解史前文明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艺术学领域，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成为了史前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体现了先民们高超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展示了那个时代对于美的追求和审美观念的变化。这件彩陶瓶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史前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为我们欣赏和理解史前艺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在科学领域，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通过对这件文物的材质、工艺和纹饰等方面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以及制陶技艺的发展水平。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了解史前科技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考古发现

甘肃靖远乌兰镇发现迄今保存最完好的白垩纪斯氏蹠脚龙足迹

□ 本报记者 王荣

1月6日，由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单位组成的联合科研团队宣布，在甘肃省靖远县乌兰镇发现了一批距今约1.3亿至1.2亿年的白垩纪时期斯氏蹠脚龙足迹。这批足迹是甘肃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兽脚类恐龙足迹之一，相关研究成果已于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历史生物学》上发表。

这一重大发现的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乌兰镇的一个村落在进行河堤修建时，意外地暴露了白垩纪时期的岩层。然而，这些珍贵的岩层并未立即引起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直到几十年后的2023年，才迎来了科学研究的曙光。

2023年6月，由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专家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对乌兰镇这一化石点进行了实地考察。科研团队在位于一处悬崖的岩层底部，发现了一处面积约62平方米的恐龙足迹。这些足迹悬空在一人高的岩层底部，由于长时间的天然侵蚀和风化作用，岩壁上的痕迹显得既神秘又引人入胜。

通过对足迹的详细研究，专家们发现这些足迹属于三趾型兽脚类恐龙，数量至少有67个，长度范围在11厘米至21厘米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足迹都没有保存第一趾和尾迹，但第二趾与第四趾的趾间角较宽等特征，使其可以归入中国侏罗—白垩纪常见的斯氏蹠脚龙足迹。这一发现为科学家们提供了研究白垩纪恐龙生活习性和生态环境的重要线索。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邢立达表示，此次发现的恐龙足迹中，一些保存完好的足迹展示了横向拖痕，这表明兽脚类恐龙在行走时曾发生侧滑并迅速恢复了平衡。拖痕由密集的线条组成，线条宽度平均为0.7毫米，间隔约1毫米，这些线条实际上展示了恐龙脚底鳞片的宽度与间隔。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科学家更深入地了解恐龙的生理结构，还为研究恐龙的行走姿态和行为习性提供了宝贵资料。

通过对足迹的进一步分析，研究团队还揭示了斯氏蹠脚龙的一些可能的行为学信息。通过足迹重建，科学家们发现这些斯氏蹠脚龙的髯骨长约0.6米至0.9米，体长最大可达2.5米。在行走时，它们几乎呈直线前进，显示出一种稳定而有力的步态。

此外，研究团队还发现，大小相近的足迹组成了12道行迹，其中部分行迹相互平行，行进方向相同。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恐龙的行为习性，研究团队利用异特龙的复原三维数据进行了模拟。模拟结果显示，这些体型相似的兽脚类恐龙以步行速度行进，前进时形成相对密集的阵型，个体彼此之间的距离低于身体宽度。这表明造迹者具有群居行为和自我防卫意识，它们彼此靠近很可能是为了减少个体的警戒压力，防止被天敌捕食。

遗迹学研究表明，至少一些类群的小型双足恐龙具有群居行为。乌兰镇足迹点的发现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为科学家提供了关于恐龙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的宝贵信息。邢立达认为，这些保存完好的足迹不仅记录了白垩纪恐龙生活的一瞬，还为研究斯氏蹠脚龙足迹在中国下白垩统的广泛分布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

乌兰镇的岩层属于河口群，这是我国四足动物足迹数量最丰富、多样性最高的白垩纪地层之一。研究人员在河口群的盐锅峡、关山、中铺和红古四个地区陆续记录了约31个下白垩统四足动物足迹点，包含超过1000个恐龙足迹。这些足迹包括多种多样的三趾型兽脚类足迹，如蹠脚龙足迹、实雷龙足迹和亚洲足迹等。此次在乌兰镇口群中第五个足迹富集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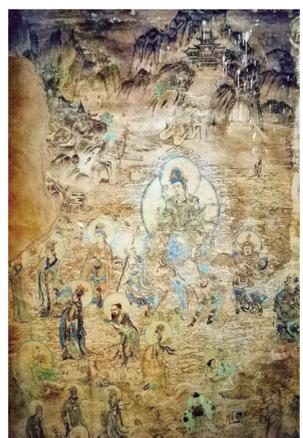
邢立达指出，这些保存完好的足迹不仅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科普意义。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白垩纪恐龙世界的窗口，让我们能够更直观地了解这些史前巨兽的生活习性和生态环境。同时，这些足迹的发现也为科学家提供了更多关于恐龙足迹形态、行为学以及生态适应性的研究线索，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恐龙这一史前生物群体的奥秘。

甘肃靖远乌兰镇发现的这批白垩纪斯氏蹠脚龙足迹不仅为科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还为公众提供了了解恐龙世界的独特视角。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有望揭示更多关于恐龙的奥秘，为探索地球生命演化的历史进程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国保单位

榆林窟：岁月河畔的佛艺瑰宝



在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南约75公里的榆林河畔，有一处被岁月雕琢的艺术殿堂——榆林窟。这里不仅是佛教信徒心中的圣地，更是历史与艺术交织的瑰宝，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和学者前来探访。

榆林窟，又名榆林寺、万佛峡和上洞子，因河岸榆树成林而得名。其窟窿开凿于峡谷东西两崖上，现存43窟，分布面积112850平方米，壁画总面积达4200平方米，彩绘佛、道图10856幅，彩塑佛、道造像244身。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段跨越千年的辉煌历史，是无数匠人血汗的结晶。

关于榆林窟的始建年代，虽无确切的文字记载，但从洞窟形式和有关题记推断，它大约开凿于隋唐以前的北魏时期。此后，唐、五代、宋、西夏、元、清各代均有开凿和绘塑，进行过大规模的兴建。走进榆林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错落有致的洞窟。它们依山傍水，巧妙地融入了周围的自然环境。洞窟形制多样，有过洞式中心柱、过洞式覆斗顶、过洞式穹窿顶、过洞式人字坡顶四种形制。每一座洞窟，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它们不仅展示了古代工匠高超的技艺，更传递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榆林窟的众多洞窟中，第三窟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这座建于西夏统治瓜州晚期的洞窟，窟内纷呈汉、藏民族及显宗、密宗的内容和艺术。是这一时期艺术最成熟、最典型的洞窟。窟中央偏后设八角形三级曼荼罗(坛城)，上存清塑数身。窟四壁下部清代环砌双层台基，上存清塑十八罗汉像。顶绘曼荼罗，中画五方佛，东壁中央绘佛传，南北侧分绘汉密五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曼荼罗、胎藏界曼荼罗及显宗天请问经变。这些壁画和雕

塑，色彩艳丽，线条流畅，生动地展现了古代佛教艺术的魅力。

除了第三窟，榆林窟的其他洞窟也各有千秋。第十三窟始建于五代时期，宋、清进行过重修。洞窟分为前后室，后室为覆斗形顶，设中心佛坛。前室的甬道顶部虽已坍塌，但残存的壁画和雕塑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古代艺术的魅力。这些洞窟内的壁画和雕塑，不仅展示了佛教文化的丰富内涵，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和审美观念。

榆林窟的壁画和雕塑，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艺术价值极高。它们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技艺，赢得了“莫高窟艺术系统的一个分支”的美誉。这些壁画和雕塑，不仅展示了古代匠人的高超技艺，更传递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到雕塑中的细节刻画，都体现了古代艺术家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

榆林窟的壁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既有佛教故事和神话传说，又有现实生活和社会风貌的描绘。这些壁画，以其生动的形象和细腻的表现手法，让人们仿佛置身于那个遥远而神秘的时代。在这些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人们的生活、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信息，从而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



除了壁画和雕塑，榆林窟还保存了大量的题记和碑刻。这些题记和碑刻，不仅记录了洞窟的开凿年代和修建历程，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它们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榆林窟作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它不仅展示了古代佛教艺术的魅力，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和审美观念。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瑰宝，更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本报综合)



文物故事

东汉“债务风云”

□ 本报记者 罗敬宇

大家听说过《建武三年侯景所责寇恩册》吗？这简直就是东汉初年的一出“老板与员工”的债务大戏！话说公元27年，东汉建武三年，有个叫寇恩的甲渠候官，他雇了一个叫寇恩的小哥帮他运鱼去骠(1)得县(今张掖甘州区)卖。寇恩给寇恩的报酬可不小，答应给他一头牛和二十七石谷，但条件是鱼得卖到四十万钱。结果寇恩运气不佳，只卖了三十二万钱，还差八万呢。寇恩一看，生气了，直接扣了寇恩的车器杂物当抵押。

第二年，寇恩跑到居延县去告状，说寇恩欠他一头牛不还。县廷的人一调查，嘿，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寇恩在路上还给寇恩的儿子还给了肉和粮食，而且他自己的儿子还给寇恩免费捕鱼捕了三个月！这些费用一加起来，早就超过那八万钱的欠款了。最后，县廷判寇恩无罪，寇恩却不服，非要上诉到太守府，结果太守府还是

维持原判。这场纠纷，不只是老板和员工之间的经济账，它还让我们看到了东汉初年的社会结构和法律程序。那时候的侯官、都尉府、部、随这些层级，咱们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在当时那可是边郡的官制体系。甲渠候官还是个大官呢，管着七十座左右的烽燧，官吏、戍卒加起来有好几百人。而且，这篇文章里的内容还不止这些。它还记录了当时的物价、工价和货币使用情况，比如一天工钱能买多少粮食，一石粮食值多少钱。咱们现在读起来，就像是看到了一张东汉初年的“生活账单”。

总之，《建武三年侯景所责寇恩册》这个简牍啊，就像是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能窥见东汉初年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来甘肃简牍博物馆看看，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故事！